

九十年代 文存

1990~2000

【下卷】

■ 林大中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九十年代文存

【下卷】

■林大中◎主编



目 录

- 001 完美的假定 / 韩少功
- 016 沪上思絮录 / 王 蒙
- 029 追问录 / 王 晓明
- 045 谁的“人类” / 李 锐
- 052 阴晴不定的日子 / 葛兆光
- 060 最是文人不自由 / 葛兆光
- 070 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 / 谢 泳
- 078 《顾准文集》序 / 王元化
- 081 闲话北大(之二) / 赵 园
- 085 作家检讨书 / 孟繁华
- 095 周扬的目光 / 王 蒙
- 101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 朱学勤
- 112 无题往事 / 徐 晓
- 133 古元的意义 / 徐 冰
- 137 从“卤水罐”到“枣木扁担” / 罗 岗

- 144 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 / 雷 颐
- 149 辛丰年其人 / 严 锋
- 161 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 / 徐友渔
- 172 作家村里的枪声 / 蓝英年
- 181 帕尔梅墓前的沉思 / 高建平
- 187 小城思索 / 龙应台
- 196 难以描述的旅行 / 西 川
- 206 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 / 王彬彬
- 225 在历史中寻找什么 / 孙 歌
- 234 寻找苏青 / 王安忆
- 243 道不自器 兴之圆方 / 李 陀
- 255 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 余 华
- 263 “大院”里的孩子们 / 刘心武
- 272 文学的背景 / 卢跃刚
- 278 摇滚乐的失语症 / 李 皖
- 284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 王晓明
- 306 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 / 许 明
- 322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 王小波
- 325 医学的人文品格 / 周国平
- 331 教化的困惑 / 黄 平

336	关于梦与理想区分的备忘录 / 萌 萌
342	该说话时就说话 / 陈家琪
348	天演 = 进化? = 进步? / 林基成
360	关键在于立宪 / 资中筠
370	环境的起源 / 唐晓峰
376	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 钱理群
385	孔林片思 / 费孝通
391	后记 / 林大中

完美的假定

■ 韩少功

回顾一下 30 年代，也许会使现在很多人大大为惊讶，那是史学家命名的“红色 30 年代”，批判体制的文学，“劳工神圣”的口号，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卫队员，不会提供一分钱利润，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一般上流开明人物的思想时尚，不管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左派组织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渐壮大，眼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布莱希特、A. 勃勒东、阿拉贡、加缪、德莱赛、瞿秋白、聂鲁达、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无不具有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纪录。

60 年代，又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烧。中国“文革”不用说，法国的“红五月”也惊天动地，小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勃涅日列夫在苏联上台向左转，太平洋彼岸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交相辉映，在白宫前炮打司令部。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数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弱小民族，竞相把“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当作救国的良方，不仅是格瓦拉、德钦丹东和阿拉法特，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眼的时代明星，成了偶像和传说。

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

二

同样并不遥远的，是潮起潮落，每一次左向的转折之后，都似乎紧接着向右的反复和循环。左派的理想，左派在这个时代的诸多特定含义：国有化、计划经济、大公无私、阶级斗争、均贫富、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等等，从来没有得到历史的偏宠，在实践中并非能够无往不胜。

变化周期似乎总在 10 到 20 年之间。

30 年代以后是 50 年代，是匈牙利事变，南斯拉夫的半自由化转向，中国的夏季鸣放和庐山诤谏，苏共的二十大反“左”报告以及社会的全面“解冻”，欧美各个共产党的纷纷萎缩或溃散，加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插曲。对于左翼阵营来说，一个云雾低迷和寒气暗生之秋已经来临。红色政权即便可以用武装平息内乱，用政治高压给经济运行的钟表再紧一把发条，但发条上得再紧，很多零件已经出现的锈蚀和裂痕却没法消除，故障噪声已经嘎嘎渐强。

60 年代的狂热一旦落幕，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沉重地偏移。共产主义的行情走低，在 80 年代一路破底。一夜之间，柏林墙推倒了，革命导师的塑像锯倒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易帜，贫穷而忿激的人们成群结队越过边界，投奔西方，寻找面包、暖气、摇滚乐、丰田汽车、言论自由、绿卡以及同情的目光，甚至在凯旋门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热泪盈眶。在很多地方，“左”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贬词。众多知识分子对自己在 3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经历深表忏悔和羞愧，至少也是闪烁其言，或者三缄其口。相反，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的管理体制和技术成就，重新认识和评价个人主义之类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全球性知识界的流行话题，成了现代人开明形象的文化徽章。

“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经“化”了的地方也还嫌化得不够彻底，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接连出台，向自家园子里的经济国有成分和社会福利政策下刀，竟没有太多的反对派胆敢多嘴。

一个西方记者说，眼下除了梵蒂冈教皇和朝鲜，再没有人批评资本主义了。这个话当然夸大不实。但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现在还有多少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在继续憎恶利润和资本呢？还有多少听众会从这些政党的背影汲取自己生存的信心呢？也许，这是一个传统左翼人士不愿正视的问题，却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

事情已经大变。对变化的过程，当然还需要由历史学家作出更周详更精确更清晰的描述。一个基本的现象，却不难在我们粗略的回顾中浮现，不难成为我们的视角之一：经过一个短短的周期，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60年代再版了30年代，80年代则是以西方一片眩目的现代化昌荣，使50年代得到了追认和复活。

下一个10年，会怎么样？

再下一个10年或20年，又会怎么样？

我听到未来正在一步步悄然而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物极必反，阴尽阳还；风水轮流转；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对历史演变规律的朴素把握，曾有过多神秘的揣测，两分模式也显得过于粗糙。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历史是被什么样的一只手在操纵？我感兴趣的是，不管是“左”还是右，还是别的什么，一种思想，是如何由兴到亡？一种体制，是如何由盛及衰？它们是如何产生然后耗竭了自己的思想活力和体制优势？如何获取然后丧失了自我调整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机能？如何汇聚然后流散了自己的民意资源和道义光辉从而滑向了困局——乃至冷酷无情的大限？

想一想这些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傻。

三

切，是南美洲穷苦人民对格瓦拉简短的昵称，也几乎成了相当时期内在他们之间秘密流传的神圣暗语。

这个神圣的暗语生于 1928 年，是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年轻时就习惯于独身徒步长旅，结识和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他所献身的革命游击战在古巴获胜之后，这位卡斯特罗的密友，这位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银行行长，因为失望于胜利以后的现实，突然从所有公众场合销声匿迹。

10 月，卡斯特罗公布他留下来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说：“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他决定去那些国家重新开始斗争。这位命中注定的“国际公民”，这位被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完美的人”，后来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等地的故事，我是从一部录像带里看到的。录像带有些陈旧模糊，制作者显然是一个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在他的镜头下，格瓦拉消瘦苍白，冷漠无情，偏执甚至有些神经质，是一个使观众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游击战狂人。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丛林中的饥饿，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褴褛的跋涉，在战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后捐躯时的从容——还有孤独，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他流在陌生异乡的鲜血，无疑是照亮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闪电——尽管关于他的录像带，眼下是最滞销的之一，最没有人要看的之一。租带店的青年这样告诉我。

与格瓦拉同时代的吉拉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理想者。与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选择了更“左”的道路，而是从右的方向，开始了他新的生命——当时他同样官阶显赫位极人臣，1953 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国会议长，是铁托最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他的第一本书传入中国，是 60 年代中期在部分红卫兵中

偷偷翻印和传阅着的《新阶级》，与遇罗克的《出身论》同时不胫而走。在我读过的一本字迹模糊的油印小册子上，作者当时的译名叫“德热拉斯”。读到他的第二本书则是80年代了。《不完美的社会》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级等等问题，给我的印象，作者对这个世界有现实感，拒绝相信和许诺任何“完美”的社会模式。他描绘了资本主义正在汲收社会主义（比方社会福利政策），而社会主义也必须汲收资本主义（比方市场经济）的前景。他的很多观点，无异于后来大规模改革的理论索引。

因为发表这些文章，加上因为公开在西方报刊撰文同情匈牙利事变等等，他不但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而且三度入狱，被指责为革命的罪人，比彭德怀的遭遇还要惨。他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后果，不，他极为清醒地为自己选择了通向地狱之路。当他打算与同僚们分道的时候，他满心哀伤和留恋，也不无临难的恐惧。《不完美的社会》中很多论述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段描写历历在目：在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灯火辉煌，丰盛的晚宴如常进行，留声机里播送着假日和盛情。在一大群快乐的党政要人里，只有吉拉斯在灯光照不到的暗角里，像突然发作了热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仍然在为他 and 同僚们当侍者。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现在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惟一变化了的，是别墅主人的面孔。他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刺心的问题：胜利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夜晚，他在家来回踱步整整一个夜晚。家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用他的想法惊扰家人。但他决定了，决定了自己无可返程的启程。如果他一直犹豫着，该不该放弃自己的高位，该不该公示自己的批判，那么在天将拂晓的那一刻，全部勇敢和果决，注入了他平静的双眼。

欧洲一个极为普通的长夜。

这个长夜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同情心，责任感，亲切的回忆，挑战自己的大义大勇，不独为左派专有。这个长夜使所有经过了那个年代的我们羞愧，使我们太多太多的日子空洞而苍白。

四

初读吉拉斯的时候，我还不大能接受他的奇异。再读吉拉斯的时候，又觉得他的理论深度和广度不够我解渴，某些看法也可存疑。但这并不妨碍我的感动。

我庆幸自己还有感动的能力，还能发现感动的亮点，并把它与重要或不重要的观念剥离。我经历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在诸多人事之后终于有了中年的成熟。其中最重要的心得就是：不再在乎观念，不再以观念取人。因此，我讨厌无聊的同道，敬仰优美的敌手，蔑视贫乏的正确，同情天真而热情的错误。我希望能够以此保护自己的敏感和宽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拉斯的理论是不太重要的，与格瓦拉的区别是不太重要的，与甘地、鲁迅、林肯、白求恩、屈原、谭嗣同、托尔斯泰、布鲁诺以及更多不知名的热血之躯的区别，同样是不太重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历史处境，可以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政治立场，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宗教观、审美观、学术观、伦理观……一句话，有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但这些多样而且多变的意识形态后面，透出了他们彼此相通的情怀，透出了一种共同的温暖，悄悄潜入我们的心灵。他们的立场可以是激进主义也可以是保守主义，可以是权威主义也可以是民主主义，可以是暴力主义也可以是和平主义，可以是悲观主义也可以是乐观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呈现出同一种血质，组成同一个族类，拥有同一个姓名：理想者。

历史一页页翻去；他们留下来了。各种学说和事件不断远退，他们凝定成记忆。后人去理解他们，总是滤取他们的人格，不自觉地忽略了他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残痕。他们似乎是各种不同的乐器，演奏了同一曲旋律；是不同轨迹和去向的天体，辉耀同样的星光。

于是，他们的理想超越着具体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不再是名词，更像一个动词。

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在当今一些批评家那里，即便再强健再精美的意识形态，都经受着怀疑主义的高温高压，也面临着消解和崩溃的危险，何况其他。随便拈一句话，都可以揭破其中逻辑的脆弱，词语的遮蔽，任何命题的测不准性质，于是任何肖像都可以迅速地变成鬼脸或者漫画。问题在于，把一个个主义投入检疫和消毒的流水线，是重要而必要的；但任何主义都是人的主义，辨析主义坐标下人生状态，辨析思想赖以发育和生长的精神基质和智慧含量，常常是更重要的批判，也是更有现实性的批判，是理论返回生命和世界的入口。

意识形态不是人性的惟一剖面。格瓦拉可以过时，吉拉斯也可以被消解，但他们与仿格瓦拉和伪吉拉斯永远不是一回事。他们的存在，使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远有了崇高和庸俗的区别。

这不是什么理论，不需要什么知识和智商，只是一种最简单最简单的常识，一个无需教授也无需副教授无需研究生也无需本科生就能理解的东西：

美的选择。

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Libido for Ugly（对丑的情欲）》，一个西方记者写的。文章指出实利主义的追求，使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丑物丑态，不失为一篇幽默可心警意凌厉的妙文。很

长时间内，我也在实利中挣扎和追逐，渐入美的忘却。平宁而富庶的小日子正在兴致勃勃地开始，忘却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灵安全设备。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政治：一个丛林里的“红色高棉”，第二职业是为政府军打工。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宗教：一个讲堂上仙风道骨的空门大师，另一项方便法门是房地产投机的盘算。我们开始习惯这样的文人多元：在北京的派别纷争可以闹到沸反喧天不共戴天的程度，但纷争双方的有些人，一旦到了深圳或香港，就完全可能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设同样的宰客骗局，打探同样的异性按摩，使人没法对他们昨日的纷争较真。我们开始习惯西方资本主义的语言强制，interest（利益）与 interest（兴趣）同义，business（生意）与 business（正经事）同义，这样的语言逻辑十分顺耳。我们习惯越来越多名誉化的教授，名誉化的官员，名誉化的记者，名誉化的慈善家和革命党，其实质可一个“利”字了结。总之，我们习惯了宽容这些并不违法的体制化庸俗。我们已经习惯把“崇高”一类词语，当做战争或灾难关头的特定文物，让可笑的怀旧者们去珍藏。

我们只有在猛然回头的时候，偶尔面对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才会发现我们少了点什么。不，我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少，甚至比以前更加自由和丰富，但我们最终没法回避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内心已经空洞，我们的理想已经泛滥成流行歌台上的挤眉弄眼，却不再是我们的生命。

没有理想的自由和丰富，只是千差万别的行尸走肉。没有理想的文化多元，只是服装优美设备精良的诸多球赛，一场场看去却殊少趣味，没有及格的水准，没有稍稍让人亮眼的精神纪录。

五

理想从来没有高纯度的范本。它只是一种完美的假定——有

点像数学中的虚数，比如 $\sqrt{-1}$ 。这个数没有实际的外物可以对应，而且完全违反常理，但它常常成为运算长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和重要引导。它的出现，是心智对物界和实证的超越，是数学之镜中一次美丽的日出。

严格地说，精神的 $\sqrt{-1}$ 还有“自由”、“虚无”、“人性”、“自我”、“真实”等等。只要没有丧失经验的常识，谁会相信现实中的人可以拥有完全绝对的“自由”呢？可以修炼出完全绝对的“虚无”呢？可以找到完全抽象的“人性”？可以裸示完全独立的“真实自我”？……但是，如果因而取消这一类概念，取消这些有益的假定，我们很难想象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比较起来，在很多人那里，理解“理想”比理解其他假定要困难得多，要让人大皱眉头，不管加上多少限定成分的佐料，配上多少美言名言格言的开胃酒水，还是咽不下这个词。这并不妨碍他们正在努力——也在要求人们努力——理解世俗，理解惟利是图，理解卡拉 OK，理解摧眉折腰和告密，理解三陪小姐和红灯区，理解用红包买来的文学研讨会，理解十万元养一条狗，理解中国人对中国人偏偏不讲中国话。

理解是个意义含混的词。理解不等于赞同。理解加激赏算是理解，理解但有所保留算不算理解？理解但提出异议算不算理解？提出异议但并没有要求政府禁止没有设冤狱也没有搞打砸抢，为什么就要被指责为白痴或暴徒式的“不理解”？驳杂万端的世俗确实是不可能定于一格的，需要人们有更多的理解力，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是世俗，远没有中产起来的更多退休工和打工仔也是世俗；星级宾馆里的欲望是世俗，穷乡僻壤里的朴实、忠厚、贫困甚至永远搭不上现代化快车的可能也是世俗；商品经济使这里富民强国是世俗，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商品经济造成贫富差别、环境污染、文化危机等

弊端也是世俗，对后者保持距离给予批判的人，其优劣长短生老病死，本身同样是不折不扣的斯世斯俗，是不是也需要理解？“世俗”什么时候成了一部分人而且是一小部分人的会员制俱乐部？

滥用“理解”、“世俗”一类的词，是一些朋友的盲目和糊涂，在另一些人那里，则是文字障眼术，是不便明言的背弃，周到设防的勾搭，早已踩进去了一脚，却继续保持局外者的公允和超然，操作能进能退的优越。这些人精神失节的过程，也是越来越怯于把话说个明白的过程。

其实，真正的理想者是不要求理解的，甚至压根儿不在乎理解。恰恰相反，如果他每天都要吮着理解的奶瓶，都要躺入理解的按摩床，千方百计索取理解的回报，如果他对误解的处境焦急和愤懑，对调头而去的人渐生仇恨乃至报复之心，失去了笑容和平常心，那么他就早已离理想十万八千里，早已成为自己所反对的人。理想的核心是利他，而利他须以他人的利己为条件，为着落——决不是把利益视为一种邪恶然后强加于人。光明不是黑暗，但光明以黑暗为前提，理想者以自己并不一定赞同的众多异类作为永远忠诚奉献的对象。他们不会一般化地反对自利，只是反对那种靠权势榨取人们奴隶式利他行为的自利。而刻意倡导利他的人，有时候恰恰会是这些人——当他们手里拿着奴隶主的鞭子。理想者也不会一般化地反对庸俗，只是反对那种吸食了他人之血以后立刻嘲笑崇高并且用“潇洒”、“率真”一类现代油彩打扮自己的庸俗。而刻意歌颂崇高的人，有时候恰恰会是这些人——此时的他们可能正在叩门求助，引诱他人再一次放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想最不能容忍的倒不是非理想，而是非理想的极端化与恶质化与强权化——其中包括随机实用以巧取豪夺他人利益的伪理想。

六

历史上，暴君肆虐、外敌入侵或者天灾降临之际，大多数人必须依靠整体行动才能抵抗威胁，理想便成为了万众追随的旗帜，成为一幕幕历史壮剧的脚本。对于理想者来说，这是一个理解丰收的时代。好心人不必因此而自慰，不必在意哲学家关于“人性趋上”的种种喜报。事实上，特定条件下的利义统一，作为理想畅行一时的基础，不可能恒久不变。

理想者更多理解稀缺的时代。在人们的利益更多地来自个人奋斗的时候，社会提供一种利益分割贫富有别鼓励竞争的格局，通常的情况下，理想无助于一己的增利，反而意味着利益的它移，于是成为很多人的沉重负担，成为额外的无限捐税，无异于一种压迫欲望的侵夺。他们即便对崇高保持惯性的客套，内心的怀疑、抗拒、嘲弄以及为我所用的曲解冲动却会一天天燃烧如炽。这没有什么。好心人不必因此而悲哀，不必在意哲学家关于“人性趋下”的诊断。事实上，特定条件下的利义分离，作为理想一时冷落的主要原因，同样不会恒久不易。

舍利取义是群体的需要，却不是个体的必然。宗教有一种梦想：使大众统统成为义士和圣徒。每一种教义无不谴责和警戒利欲，无不指示逃离世俗的光明天国，而且奇迹般地获得过成千上万的信众，成了一支支现实的强大力量，成为历史暗夜里一代一代的精神传灯。不幸的是，宗教一旦体制化，一旦大规模地扩张并且掌握政权，不是毁灭于自己的内部，滋生数不胜数的伪行和腐败；就是毁灭于外部，用十字军东征一类的圣战，用宗教法庭对待科学的火刑，染上满身鲜血，浮现出狰狞的面孔。

左派的“文革”也是一种宗教，也曾经有改造大众的宏伟构思。他们用世界大同的美景，用大公无私的操行律令，用一个接

一个交心自省活动，用清除一切资产阶级文化的大查禁大扫荡大批判，力图在无菌式的环境里训练出一个特殊材料做成的没有任何低级趣味的民族。这场运动得助于它的道义光环，曾经鼓动了人们的激情，甚至使很多运动对象都放弃了心理抵抗，由此多少掩盖了运动当局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种种不智。但一场以精神净化为目标的运动，最终通向了世界上巨大的精神垃圾场。比较来说，当时的人们还能忍受贫穷——毕竟比战争年代要强一些，人们在那个时候没有失去对革命的信任。人们最无法容忍的是满世界的假话和空话，是遍布国家的残暴和人人自危的恐怖，是特权贵族奢华生活的真相大白。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历了当年，都有铭心的记忆。时间流逝，常常使以前的日子变得熠熠闪光引人怀恋。某些左派寻求理想的梦幻的时候，可能会情不自禁地举起怀旧的射镜，投向当年一张张单纯的面孔。是的，那个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贫有所怜，弱有所助，那个时候很少妓女和吸毒和官倒，那个时候犯罪率很低很低，但这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即便说明当时的人们较为淡泊钱财，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淡泊钱财没有什么了不起，钱财只是利益的形态之一。原始人也不在乎钱财，但可能毫不含糊地争夺赖以生存的神佑和人肉。下一个世纪的人也不一定在乎钱财，但可能毫不含糊地争夺信息、知识、清洁的空气或者季风。我们无须幼稚到这种地步，在这个园子里争夺萝卜的时候，就羡慕那个园子里的萝卜无人问津，以为那些人对白菜的争夺，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拥抱。

“文革”当中，利欲同样在翻腾着，同样推动无义的争夺——只是它更多以政治安全、政治权势、政治荣誉的形式出现，隐蔽了对住房、职业、级别、女色的诸多机心。那时候的告密、揭发和效忠的劲头，一点也不比后来人们争夺原始股票的劲头小到哪里去。那时候很多人对抗恶义举的胆怯和躲避，也一点